

快樂方程式

杜大衛

3年前，一位籍籍無名的卡迪夫大學學者訂立了一個備受爭議的公式，聲稱可衡量人們的幸福程度。這公式結合了天氣（W）、債務和個人償還債務的能力（D-d）、要多少時間違背其新年計劃（Tq），然後除以他們的積極程度（M）和付諸行動的急切性（Na）。跳過這些因素如何難以衡量的爭論，他計算出，1月的第3個星期一很可能是一年中最令人沮喪的一天。

今年，這天是剛好是1月18日。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上周末香港社會的焦慮會在立法會如此戲劇性地爆發。實情是，此刻的香港市民非常不快樂。這讓我想到社會的幸福感，以及港府官員們或可多花時間於測量（不）幸福感，少花一點點時間衡量經濟增長，並多去了解影響社會精神平和的因素。

80後是最不快樂無望的一群

表面上，憂愁的到來有點出人意料。在去年的世界幸福感排名中，香港排第23，是亞洲最快樂的社會，僅次於汶萊（不包括澳洲和新西蘭）。約一個月前，嶺南大學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發表了每年一度的香港幸福指數，指出平均幸福程度回升到2006年的水平。但當嶺大將數字分拆，便顯露出更深刻的理解。最快樂的是退休人士、家庭主婦或文員。若他們在職，他們享受工作，而且他們都是40歲或以上。他們還享受食物和喜歡烹飪，有強烈的宗教信仰，以及有參與義務工作。大部分在立法會示威的都是學生——社會中比較不

快樂的一群。他們顯然對食物和烹飪並不介意，否則他們不會願意在優質食物難尋的立法會門外長時間露宿。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於本周透露，香港的「80後」是最不快樂和無望的一群，四成承認有輕度至嚴重的抑鬱症症狀。青少年失業問題，顯然並非偶然，20至30歲青年的失業率處於25%的歷史性高水平，起薪點低至令人沮喪，晉升或加薪的希望亦非常渺茫。如果我們回望過去10年這一代所面對的經濟困難，難怪有那麼多人如此悲觀。

最出人意料的是香港在世界最幸福社會排名上長時間得到高排名，而我們竟未曾注意到這不安的滋長。不過，也許這亦不出奇。請注意，長毛和他的社民黨友在香港的政治中心已抬頭好幾年了。

情況亦突顯以「科學」量度幸福感似乎更接近藝術而非科學。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難以量度的。我個人的「幸福指數」很可能會簡單得多： $I+D=H$ ， I 是我， D 是「蛋撻」， H 就是幸福感。

但在這一切的「快樂煉金術」中，一些有趣及有價值的見解浮現了。美國在過去30年，收入和消費中位數節節攀升，但幸福程度卻沒有類似的升幅。其次是跟其他人比較財富似乎比財富的絕對數字比較更能帶來幸福。

盼政府仔細聆聽社會的情緒

互聯網的新技術如Twitter、Facebook和博客等也為「幸福煉金術士」提供了有趣的即時洞察力：就美國來說，08年11月4日——美國總統大選的最後一天——是美國在過去4年來的紀錄中，人們覺得最快樂的一天；數年來最不幸福的一天是米高積遜2009年去世的那一天。在美國每年的

9月11日，世界貿易中心悲劇發生的那天，平均幸福程度都會下跌。

如果更高的新水和更強購物力不是滿足全體選民的黃金路徑，那當然各國政府，包括香港政府，需要學習更多真正使選民滿意的東西。顯然地，至目前為止，國民生產總值增長未能提供多少有價值的見解。或許這就是不丹國王為什麼選擇不以國內生產總值，而以國民幸福總值來衡量國家的發展進程——一個旨在確保與環境和平共處、人民和諧的準則。它亦量度其他如保健服務及人們是否有足夠時間與家人和親人相處等東西。

雖然許多人可能覺得不丹的做法標新立異，法國總統薩科齊最近提出解決提議，他委託一批以經濟學家Joseph Stiglitz為首的經濟學專家就調整國內生產總值的量度方法作出建議，並提出嶄新和更適合量度人們安康和幸福度的方法，以及量度環境和財政的可持續性。新準則將更多的考慮收入分配和非市場活動（如休閒），它會衡量醫療服務、教育質素，以及人們取得醫療服務和教育的深度，還有對優質環境的投資，同時亦考慮破壞環境的活動，亦會考慮只反映社會問題的監獄開支和保全系統等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要會俊華和他的團隊與這種新的幸福量度準則角力，也許是有點妄想。但是，要政府仔細聆聽社會的情緒和燃起那些潛在社會負面情緒的成因，可不是過分的要

作者杜大衛 (David Dodwell) 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 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 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